

介绍早期记录外国历史的著作

王重民 遗著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正式接触，第一次是在十七世纪初年。那时候正是欧洲封建社会的后期，也就是资本主义上升的时期。它们正在瓜分和掠夺美洲和亚洲的新市场，而达到中国的大门以后，首先派进了一批作侵略准备的先遣队，由利玛窦给我们带来了《坤輿万国全图》，由艾儒略翻译了《职方外纪》，作为和中国士大夫接触的介礼。我们从这些图籍得到了不少外国知识，同时也引起了我们不少的戒心。第二次是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间，这时候，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是资本主义开始走向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就是资产阶级掌握着政权和军队，对于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侵略越来越凶暴，越来越残酷。这正是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使东方屈服于西方”的时代。所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和商人，便不再徘徊在中国的大门之外，而是用兵船和枪炮打进来。

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中国的侵略意图，不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我国具有先进思想的读书人和一部份开明官吏，早在十八世纪末年，为了应付事变，就已经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积累关于外国历史资料。

十八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对东方和对中国的侵略也就以它为首，所以在鸦片战争前后，我们着重研究的外国历史也就以英国的历史为主。

在我国旧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史料里面，对于东南亚各国悠久的历史记载是很详

细的，对于印度以西，如波斯、阿拉伯等国家，自从七世纪以后，也有比较正确的记载，但对于欧洲，则知道的极少，记录也不够正确。而那时候来侵略我们国家的，正是我们历史知识极缺乏的国家。弥补这一缺憾的第一部书是谢清高的《海录》。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人。当他十八岁的时候（1782年）到南洋去经营，覆舟，被外国商船（大概是英国的）所拯救，从此在这支商船上服役，航行在东南亚和欧洲各个商口凡十四年。到了卅一岁（1795年？），因失明便在澳门做通译。

谢清高亲眼看到了欧洲几个较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他所注意的也就正是我们全国人民所愿知道的。1820年，由他口述，由杨炳南笔录，第一次公布了他的《海录》，立即引起当时读书人和官吏们的注意，成为1820年以后五十年里面最通行的一部外国历史著作。

正在这一年（1820年）具有经济致用思想的李兆洛到了广州，他看到十三行的“洋商肆楼”，“穷巧极侈”的情形，对于了解外国事情引起了极大的注意，很快他就从吴兰修（也是嘉应州人）那里得到了《海录》的传钞本，并且加以改编和润饰，题为《海国纪闻》（《养一斋文集》卷二）。大概在1812年，《海录》有了刻本，《海国纪闻》也有钞本流传。（汪文泰在1822年引用过二十五条，内有火船、火药两条，不见今本《海录》。李兆洛说他所根据的本子是吴兰修笔

录的,大概是由于那个本子内有一些材料,为吴兰修直接得自谢清高,而为杨炳南本所没有。)

继谢清高之后,介绍外国历史的有萧令裕。萧令裕字枚生,江苏清河人。早年注意时务知识,他的评论得到当时人的赞同。1817年,阮元任两广总督,令裕随去做幕府。从此,更有机会来注意外国的事情,广泛的搜集资料。在1817—1832年间,他写成了《记英吉利》一卷(见《海国图志》卷五十三)、《记英咭求澳始末》(有传经堂刻本)与《粤东市舶论》(见《海国图志》卷七十八)。从他这些著作里,知道他在鸦片战争以前,他犀利的眼光已注意到了敌人的历史和活动,揭露了鸦片烟的毒害和英人贩卖鸦片烟的罪恶,他还指出:除了鸦片烟以外,为“各得其所”的正规交易,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萧令裕对于外国历史的研究,初步和对外政策结合起来。

1839—1840年是鸦片战争的前夕和爆发时期,更需要知道外国的情形。这一重要问题,是为从前腐朽官吏所忽视,而为抗英战争首领林则徐所重视,甚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当时澳门的外国新闻纸曾经指出:广州掌握着大权的官吏们,都是“骄傲自足”,“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坚人之事情”,可是林则徐的“行事,全与上相反”。他“预备几个最善翻译之本地人,在四方各处打听,按日期呈递,”又“将英吉利好书,译出大概之事情”。从1839年1月到1840年11月,林则徐为了了解外国动态,逐日逐月翻译《澳门新闻纸》;为了了解世界大势,翻译《四州志》。还把所翻译的新闻纸,编写成为《华事夷言》《澳门月报》,送给皇帝、官吏和读书人阅览。林则徐的这些工作,都是为了抗敌制胜,了解外国历史。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和1842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订立,给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刺激和教训,使全国人民认识了

资本主义侵略国家的狡诈,卑鄙,凶残,也认识了清政策的腐败,从而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所以,把御侮图强,向外国学习,作为研究外国历史的主要目的。

1841年2月,英国人还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激起了广东人民(如三元里)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武装反英斗争,汪文泰觉得对于敌情的传说有些“夸谩”,不利于斗争,他采辑了许多可靠的材料写成《红毛番英吉利考略》一书,“冀申同仇之志”。这是一部很谨严的著作,也是一部有政治意义的著作。

梁廷枏联系着一部份有爱国思想的读书人是在背后推动林则徐、邓廷桢抗敌最力的人,他在这一段时期之内(1838—1842年),编成了《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六卷,记当时和中国在广东有通商关系的国家:《兰峇偶说》四卷,记英国:《合省国说》三卷,记美国:《耶苏教难入中国说》一卷。梁廷枏在《合省国说》的自序里,表示赞同联邦制度和选举制度。他认为我国古书里所说的“视听自民”在封建社会里是“茫无可据”,而在共和国制度内,“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了。当然,梁廷枏尚未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也不是真懂了共和国的制度,但是他能从新的政治制度来联系我国古代进步的政治思想,在当时社会开始起了本质变化的时候,是有积极作用的。

魏源在1842年完成了他的《海国图志》。他利用了林则徐新译资料和旧有的一切资料。这是在鸦片战争时期对于外国历史研究集大成的著作,成为我国整个十九世纪内一部最重要最通行的外国历史。它的优点,不仅在集大成,主要还是在于他在《海国图志》中正式提出了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以抵抗敌人的侵略。他在自序内说: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攻夷就是办好国防,款夷就是办好外交,而要

办好国防和外交，还必须师夷长技，就是还要办好坚甲利兵，振兴工商业。魏源这就提出了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步思想，

魏源也和梁廷枏一样，称赞过美洲的联邦政治制度，但他们都没有想实现这一制度，仍然把希望寄托于腐朽的清朝封建政府。

魏源和他以前的几位留心外国历史的学者，所掌握的外国历史资料，在今天看来是极其贫乏的，他们的著作也是相当空虚杂乱的，可是他们的共同优点就是能够站在祖国的观点和立场上来介绍外国历史。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的宣传影响下，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下，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的形成，把旧有的这一优良传统逐渐丧失了。

在鸦片战争以后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840—1864年，所有关于外国的历史著作，还稍能继续保持前期的优良传统，即使有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出版了他们本国的历史，想借以影响中国的读书人，但中国读书人是不欢迎的。如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联邦志略》（1838年初译本，1862年增订本），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的《大英国志》（1856年）都是经过了梁廷枏、魏源等参考使用，才为国人所注意。就是在洋务运动的初期，王韬用编译的方法，著成了《重订法国志略》二十四卷（1871年）和《普法战纪》二十卷（1871—1873年），也还能继承着萧令裕、魏源以来优良传统，他在《法国志略》内指出：法国“教堂相望，教师如林，”“岁糜金貲鉅亿万”，是法国衰弱的原因之一。他又指出：法国“待属地土民，非惟寡恩，或且驾驭之如犬马，蹂躏之如草芥，”也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他撰《普法战纪》，充满着反对战争的论点，著成之后，又总的观察了当时世界大局，想借着英法御俄的形势，希望英法帮助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他说：“中国幅员之广过于俄、美、英，而生齿之繁，几半地球。近来仿制

船礮，技美法精，机器日兴，艺巧迭出，诚得英、法以为助，其强当无敌于天下，于御俄乎何有。”王韬希望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变成“无敌于天下”的列强之一，是幻想也是豪想，但由于他阶级出身的限制，使他不能明白：敌人那肯帮助自己来“富国强兵”！有清一代，封建政府压在头上，走改良主义道路，“变法自强”也是不可能。但是在王韬以后，对于外国历史的研究，连站在祖国的立场也没有了。

王韬著成这两部法国历史的时期，是中国堕入半殖民地地位的时期，也正是清封建政府和洋务派，假借办洋务之名，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和思想意识的时期，所以在七十年代以后，由外国人翻译外国历史代替了我们自己的外国历史著作。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她也已经翻译出版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许多历史著作，随着翻译东籍的潮流，我们更以空前的速度，从日本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历史书籍。这些外国历史译著，大致都著录在沈兆禧的《新学书目提要》卷二——历史类（1903年）和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卷一——史志类（1904年）。他们著录了这一时期内翻译出版的外国历史书籍百余种，每种书都有简明提要。

这一类的历史著作，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的时候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起了阻碍作用，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则起了敌对和反动作用。因为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是反对殖民地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

在这百余种外国历史译著里面，最通行的两种是《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1895年出版。所谓“新史”是指十九世纪的欧洲史）和《日本维新三十年史》（罗孝高

重视族谱的史料价值

崔建英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多民族、人口众多，文化灿烂的国家。全面地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需要广泛地利用现存的文献资料。

从文献资料的角度上看，几乎任何一种东西的现时用场都和原来产生它的目的不一样。《周易》，原是一部向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请求预示事物发展变化结果的占卜书，作为文献，却是一部研究古代哲学思想的不可不接触的资料；《诗经》中有一些原是统治阶级祀神祭祖、宣扬业绩的篇章，作为历史文献，却是研究周初经济制度与生产情况不可多得的材料；明清两代的《实录》，原是封建王朝自己给自己纂述的施政大事记，作为历史文献，却是价值高于其它内容类似

的“正史”、“别史”、“编年史”之类的史料；地方志原是地方行政官吏的“资政要览”，作为文献，却成为综合性的地方史料……族谱也是如此，尽管它是适应统治阶级家族或家族中的剥削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作为历史文献，也有它另一方面的用途。

族谱俗称家谱，又称统宗谱、世谱、世牒、支谱、房谱、家乘等等，都属此类。

中国的族谱起源很早。魏晋以来，谱学曾大盛。但现时传世的族谱，多是明清两代和民国期间修的，大体上保持着宋以后族谱的一般面貌，其主要组成，可分为规约、族产、传记、艺文、谱系等几个部分。记载有详有略，文笔有高有低，翔实程度也有值得推敲之处。但由于它的记载是以宗族为中

译，1898年出版）都是宣传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时期的政治思想和侵略思想，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则是要使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安然就序，并益趋巩固。译者在序文里首先欺骗读者说：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通商，“固曰为牟利而来也”，“但中华亦何尝不利？”过去外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都是由于“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就是叫中国“赏银割地”，也只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所以中国人不应该“不体天心，不知异国，不敬善人”；中国人若是有一点抵抗就是中国人自己“实有取败之理”。他最后指出：中国人必须服从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所以“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里，外国历史书籍的翻译与出版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時候，必然成为宣传殖民主义的工。1902年，孙瀚继魏源的《海国图志》，编成《海国图志征实》一百卷，他说“《魏志》尚战”，而他的《征实》“尚和”，这在我们今天看，又非常明显，是由于孙瀚投降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尚和”就是不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所以反把林则徐、魏源认为所必要的国防称为“尚战”了。这就代表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最反动的封建买办阶级的历史观。当我国民主革命运动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以后，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领导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才批判了并且纠正了这种反动历史观。